《日本汉诗史》每章都会论述该时代的诗风。总的来说，其中所谓“诗风”包含了两个因素：该时代日本汉诗人所学习的范本；日本汉诗的体式。

日本汉诗人的学习对象从六朝、初唐诗，到《文选》、《白氏文集》、《三体诗》，再到苏轼、黄庭坚等人的诗作。《日本汉诗史》并未详明其中变化的逻辑。我们只能从文本中对中日两国人员和书籍往来等线索中，看到一些外在的因素。例如明代的诗风在室町幕府时期就有影响，原因是五山诗僧和明朝的往来增多（167）。又如江户汉诗人学习对象的多样化，是由于这一时期文教发达，引进中国的诗集较为容易（218）。

日本汉诗的体式则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：五言诗，包括排律和古诗是日本汉诗人最早熟练运用的体裁，而七言诗最早多局限在一些零散的俪句上，少成篇章；进入奈良朝以后，七言诗和绝句诗增多；平安时代是日本汉诗体式发展的第一个高潮，在这一阶段除了杂言诗、回文诗、乐府等新体式之外，还出现了作为文字游戏的字训诗；第二个高潮则出现在江户时期，其间有诗余（词），更出现了用假名创作的诗——之所以仍认定其为汉诗，是因为它符合原先汉诗的押韵和节拍，只是根据日语和汉语的音节关系，将五言、七言扩充到十字和十四字（224）。

如此，日本汉诗变革到江户时代，最甚者到了只保留韵律的地步。《日本汉诗史》总结日本汉诗史的演进道路时指出：汉诗有污隆，有盛衰，但总体上来说，走的是一条逐渐发达的道路。菅谷军次郎认为这是皇统的恩惠所致（450）。然而正因为其尊皇观念贯穿始终，不能就此停止追问，否则会有将日本汉诗发展的内在动力过分简化的危险。

抱着这样的疑问，我们将重新回顾《日本汉诗史》中的隐含线索。

文本强调了日本汉诗人所共有的精神特点：同化他国的文化物质，并发挥出新的特征。这里的“同化”和在当今的日本汉诗研究中广泛运用的“受容”具有相近的语义，但仍有不同。受容（じゅよう）的基本含义是：从他者处取得某物，并吸收。这里可以看到受容者的主动性，以及受容对象的异质性，两者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是同时被强调的。但本书中的“同化”，是强调主体性的同时，试图取消异质性。假名汉诗对汉诗形式中汉字核心地位的消解，就是取消异质性的一种尝试。

与“同化”模型相对的，概括日本文化接触异质文化方式的，还有一种“郊外”模型。日本古典文学专家古桥信孝认为，日本自平城京建立以来，就形成了所谓“郊外文化”。郊外文化的空间特征就是：没有明确的城墙对城内、城外进行区隔，而是通过郊外这一区域来连接二者（日本文学史，334）。这种空间特征决定了日本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互动方式。首先，没有城墙的情况意味着内部的一方对外部文化采取开放态度，地理边界的消失同时对双方构成可能的向心力。其次，因为权力中心固定且辐射范围有限，作为缓冲区的郊外既是自然形成的，也是无力扩张的。在郊外，两种文化交互的结果是一种混合，而不是如“同化”模型那样带有侵略性质的取代。

由此可以认为，《日本汉诗史》视“同化”这一国民精神为日本汉诗发展的动力。而作为这一精神载体的日本汉诗人，他们的个性是无法泯灭的。正如菅谷军次郎在总结室町幕府的诗人派别时所指出的那样，不论是台阁，还是武士，抑或五山，这些只是概括，并不能遮蔽每个诗人的个人特质（167）。正因如此，体现了日本人特色和日本风格的“和臭”不应成为赏鉴汉诗的障碍，相反，它才是汉诗的趣味所在。